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智慧

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功者,他的成功,体现了政治家的智慧。这种政治智慧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它是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判断。第二个层次,它是当时许多智慧者的共识。第三个层次,曹操是把这种智慧唯一付诸实践的人。从政治史角度看,“汉德虽衰,天命未改”,要想在这个躯壳下逐渐整合分崩的碎片,达到局部统一,进而恢复传统的大一统,“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必需的选择,这体现了时人对社会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是认知层面的智慧。这种认知智慧并非曹操一人所有,而是一些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士的共识,是集体的智慧。曹操既是这个智慧的实践者,又在实践过程中同样表现出政治家的智慧。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多层智慧的整合。

关键词:挟天子;智慧;曹操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22)04-0001-06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影响三国历史的大事件,也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活动。因此,此政治事件引起历代史家的特别关注,也是当代三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代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评价很多:有人认为,这是曹操政治战略的核心;有人则从此事对曹操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有人认为,“对曹操挟天子的政治优势不能估价过高,挟天子是把双刃剑,利弊各得其半”;有人认为,曹操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霸府政治^①。这些评价基本上都是把“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一种政治战略或策略,从而研究它与当时政治之间的关系,但少有深入到策略本身发现其思想价值的成果。本文从智慧角度观察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希望对其实现新的观察视角和价值判断。

一、正确地判断形势

自从春秋时期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历史上效法者有之,嗤之不屑者有之。前者典型者当属曹操,后者典型者当属梁武帝。南朝萧齐末年,东昏侯萧宝卷昏虐荒淫,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秣马厉兵准备起兵讨伐。后来加入萧衍阵线的还有西中郎将长史萧颖胄,与萧衍不同的是,萧颖胄的上司荆州刺史萧宝融在荆州即皇帝位,萧颖胄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在此以前,萧衍的部下曹景宗、杜思冲也曾劝萧衍把萧宝融迎到襄阳立为皇帝,但萧衍没有采纳。王茂、张弘策也对萧衍不争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感到不解,萧衍说:“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威誓四海,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收稿日期:2022-03-23

作者简介:梁满仓(1951—),男,河北涿州人,研究员,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①这四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评价,分别见(一)孔祥军:《曹操政治战略核心研究——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考察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二)张红霞、陈金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王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策略之得失析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李俊芳、阎进新:《从“挟天子以令诸侯”看曹操的战略得失》,《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三)朱子彦:《曹魏代汉前的政治运作》,《史林》2012年第5期。(四)王彦:《论曹操霸府政治的合法性》,《管理观察》2008年11月上旬刊;柳春新:《曹操霸府述论》,《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岂是碌碌受人处分？待至石城，当面晓王茂、曹景宗也。”^{[1]5} 结果是，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优势的萧衍最后取代了萧齐建立了梁朝。

唐赵蕤评论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败，何也？对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肆行凶暴，继体不足以自存；人望所归，匹夫可以成洪业。夫天命底止，唯乐推有自来矣。当火德不竞，群豪虎争，汉祚虽衰，人望未改，故魏武奉天子以从人欲，仗大顺以令宇内，使天下之士委忠霸图。《传》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斯之谓矣。齐时则不然，溥天思乱，海水群飞，当百姓与能之秋，属三灵改卜之日，若挟旧主不亦违乎？故《传》讥裴弘欲兴天之欲坏，而美蔡墨雷乘干之说，是以其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败也。”^{[2]164} 赵蕤所说“有以之败”，当指萧颖胄相对萧衍之“成”而言。

“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曹操眼里具有推进王霸之业的价值，在萧衍眼里却是一文不值的草芥。为什么二者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会有云泥之别呢？其关键在哪里呢？

曹操、梁武帝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取舍，都得益于对具体形势的正确判断。正确判断形势是一种智慧，因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其政治智慧内容的第一个层次。

古代臣下对待皇帝基本上持有三种态度：皇帝有权威时“尊天子”，西汉严安评价春秋五霸，说他们“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皇帝无权威时“挟天子”，诸葛亮说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皇帝无用时“废天子”，如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包含了对王朝及其最高权威皇帝的价值判断。三国孙吴薛莹评论东汉末期的局势说：

汉氏中兴，至于延平而世业损矣。冲质短祚，孝桓无嗣，母后称制，奸臣执政。孝灵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蕃侯而绍皇统，不恤宗绪，不祇天命，上亏三光之明，下伤亿兆之望。于时爵服横流，官以贿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皂隶，迁官袭级，无不以货。刑戮无辜，摧扑忠良，佞谀在侧，直言不闻。是以贤智退而穷处，忠良摈于下位，遂至奸雄锋起，法防隳坏，夷狄并侵，盗贼靡沸，小者带城邑，大者连州郡。编户骚动，人人思乱。当此之时，已无天子矣。^{[3]440}

东汉王朝至和帝、殇帝后便开始衰落，到灵帝时达“已无天子”的程度。所谓“无天子”并非真的

没有了皇帝，而是没有了天子的权威，天子既然不受“尊”，自然降到了被“挟”的地位。

东汉皇帝的权威虽然丧失，但绝非可有可无。“汉德虽衰，天命未改”，这种思想意识仍存在于许多人的头脑中，这种思想意识的改变显然落后于社会变化的现实。这是由于东汉初最高统治者倡导的结果。清初人顾炎武曾概括当时的风气说：“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桓灵之际，社会到了“主政荒谬”，“编户骚动，人人思乱”的地步，而士大夫却仍“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4]587}。范晔也说：“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5]2589} 这种情况说明，东汉肌体虽已僵硬，但抱有起死回生心态的忠臣大有人在。如汉桓帝时，朝政已经腐败，而尚书令陈蕃仍向朝廷举荐徐穉、姜肱、袁闳、韦著、李昙等五位德行纯备的处士，希望他们“协亮天工”，“翼宣盛美，增光日明”^{[5]1747}。汉灵帝光和七年（184）爆发了黄巾起义，左中郎将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赐爵封侯，威震天下。一个当过信都令名叫阎忠的人对皇甫嵩说：“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皇甫嵩说：“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阎忠说：“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皇甫嵩拒绝说：“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范晔说皇甫嵩：“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5]2589} 曾和皇甫嵩一起镇压黄巾军的傅燮，后来被排挤，到汉阳郡（甘肃天水）任太守。金城人王国联合北地胡攻打郡城，他的儿子傅幹说：“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归，愿必许之。徐至乡里，率厉义徒，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傅燮说：“汝知吾必死邪？盖‘圣达节，次守节’。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

称其贤。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5]1878}最后，傅燮战死。

与陈蕃、皇甫嵩、傅燮等人的行为截然相反，也有人认为汉德已亡，应当另立新朝。最典型的是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类似想法的还有袁术。当时流行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也。”涂即路也，袁术字公路，名和字与谶语合，他认为，“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5]2439}。所以在建安二年，袁术借符命在九江称帝，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上述陈蕃、皇甫嵩、傅燮等人对东汉王朝的态度，是“汉德虽衰，天命未改”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这是东汉末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张角、袁术的所作所为，体现了“汉德衰亡，天命当改”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当时极度没有市场，黄巾起义的失败，袁术众叛亲离，呕血而亡的下场，都证明立即改朝换代是行不通的。“天命未改”思想潮流的强大从正面说明立即取代汉朝阻力重重，“天命当改”思想的不堪一击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马上龙登九五说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建立在对上述思想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所反映的是“汉德已衰，天命将改”的思想。汉德已衰不可重振，天命将改则预示了天命必改的趋势。他既区别于天命依然眷顾汉朝，从而对朝廷表现出绝对的忠诚，也不同于天命当改从而建号称帝，而是看到即将改朝换代的趋势，从而认定皇帝还有暂时存在的价值。“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的政治决策，而这个决策的思想基础是对东汉末期社会政治及未来走向的深入观察和正确判断，因而在社会思想层面体现了高超的智慧。

二、智者的共识

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意义的认识不是曹操的专利，而是一些智者的共识，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智慧的第二个层次。

张承是汉司徒张敞之孙，与其兄张范俱知名于世。袁术倚仗自己兵强地广，欲代汉称帝，征询张承的意见，张承则说：“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

足为难。若苟僭拟，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可见其是很有见地的人。官渡之战前夕，袁术认为曹操以弊兵数千敌袁绍十万之众，必败无疑。张承却说：“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6]337}

田丰、沮授也是当时的智者，史载田丰“天姿瑰杰，权略多奇”，“博览多识，名重州党”^{[6]201}。沮授“少有大志，多权略”^{[6]192}。孔融称田丰为“智计之士”，他在袁绍手下，出谋歼灭公孙瓒。官渡之战中，田丰、沮授为袁绍所献之策，如果被采纳，足以使曹操陷于灭顶之灾。孙盛说他们的智计虽张良、陈平无以过之。据《献帝春秋》载，袁绍军叛投曹操的兵士对曹操说：“田丰使绍早袭许，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6]16}《献帝传》也记载，沮授给袁绍献策说：“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初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6]195}

诸葛亮是三国中最具智慧的人，他为刘备分析天下大势，在其著名的《隆中对》中有这样一句话：“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6]912}诸葛亮把“挟天子而令诸侯”看作是曹操的“不可与争锋”的政治优势，可见他对“挟天子而令诸侯”作用认识之深刻。

武威姑臧人贾诩，年少时便被人誉为有张良、陈平之奇。陈寿也称赞他“算无遗策，经达权变”。他在成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之前，曾在南阳为张绣出谋划策。官渡之战前，袁绍拉拢张绣，以形成对曹操南北夹击之势；曹操也争取张绣，以解除后顾之忧之专力对付袁绍。张绣问贾诩该投靠谁，贾诩劝张绣投靠曹操，“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便是重要理由之一^{[6]329}。当时从表面看，袁绍兵多粮足，曹操兵力相对寡弱，然而贾诩却从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看到了曹胜袁败的未来，亦见其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意义的洞悉。

毛玠任曹操的治中从事、丞相府东曹掾，有政治才能。《先贤行状》评价他说：“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励行。”^{[6]375}曹操任兖州刺史时，毛玠建议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

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6]374-375}毛玠把“奉天子以令不臣”和“修耕植,畜军资”作为实现霸业的政治之基和经济之本,亦见其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深刻的认识。

官渡之战后,袁绍的儿子袁尚派人与关中马腾、韩遂联合,一起对付曹操。傅幹对马腾说:“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6]393}傅幹何许人也?傅幹字彦材,北地人,官至曹操丞相参军、仓曹属。刘备在荆州站稳后,又向巴蜀进军。丞相掾赵戩说:“刘备其不济乎?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蜀虽小区,险固四塞,独守之国,难卒并也。”而傅幹却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6]883}事实发展也正如傅幹所料,可见傅幹也是很有见地的人。

张承、田丰、沮授、诸葛亮、贾诩、毛玠、傅幹应该是三国时具有战略眼光的智者,“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魏集团以外诸如张承、田丰、沮授、诸葛亮等人的提法,“奉天子以令诸侯”是曹魏集团内的人对“挟天子”加以美饰之词,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他们都正确认识到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认识到“挟天子”的政治威力和号召作用。

三、把认识付诸实践

曹操是唯一名实俱备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实践者,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智慧的第三个层次。“名实俱备”是相对于“有实无名”者而言。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有名与无名的区别,实际上包含了行为上的合法与否和实践上的难易不同。例如孙氏父子与刘备都是打着汉朝的旗号扩张势力,但由于他们无挟天子之名,历史上没有人说他们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唯其无挟天子之名,孙策的讨逆将军和孙权的讨虏将军名号,要通过曹操上表册封才具有合法性,而刘备称王,只能通过距朝廷千里之外读一遍奏章便加王冠于顶的非法方式实现。更加重要的是,有名与无名在政治实践中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孙权、刘备没有挟天子之名,所以没有汉朝廷的约束,没有汉遗臣掣肘,没有政敌的威胁。曹操有挟天子之名,就要处理好与献帝的关系,解决汉朝遗臣所出的种种难题,粉碎政敌的危险图谋。

唯一的实践者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曹操与董卓的区别。董卓借东汉末外戚与宦官争斗而渔利,带兵进入洛阳,把皇帝控制于股掌,旋即废少立献,似乎是第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但董卓只是一个鲁莽武夫,根本没有政治头脑,从其“刘氏种不足复遗”一语可知他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智慧,因此也没有形成一个文武相济的政治集团。这也决定了董卓只能是一个粗暴专横残忍滥杀的独夫,一个随时准备称帝的野心家。而曹操则不同,他是反对董卓暴政的最坚决者,他不满意袁绍为首的讨董联盟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不顾自己军孤势弱,独自率军进攻董卓。正如王夫之所说:“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7]608}曹操解释自己之所以冒险孤军与董卓军奋战的理由说,董卓“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6]7}。可见曹操的军事行动是抱有使天下归于安定的政治目标的。二十多年后,曹操回忆自己的政治军事生涯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6]33}曹操的政治抱负是平庸暴虐的董卓难以望其项背的。唯一的实践者的第二层意思是就曹操的能力和敏感而言。如上所说,张承、田丰、沮授、诸葛亮、贾诩、毛玠、傅幹都认识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重要性,但他们绝大多数只停留在认识层面,没有力量或者机会去实现它。有力量或者有机会的人如董卓、袁绍却因没有政治眼光放弃了它。所以说曹操是唯一的既有政治眼光又有力量抓住“挟天子以令诸侯”机会的人。

把“挟天子以令诸侯”付诸实践同样需要智慧和胆识。郭图曾劝袁绍不要“挟天子”说:“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6]195}郭图固然政治上短视,但有一点说得没错,即把天子迎到身边,会有一种从违两难的尴尬。如何在既不削弱权力又不给人以篡夺口实之间掌握分寸,曹操需要表现出政治家的智慧和胆识。

毫无疑问,既然要“挟天子”,首先必须加强自己的权力。曹操把献帝迎到许昌定都后,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对于一切试图加强皇帝

权力削弱或剥夺自己权力的人毫不客气。议郎赵彦曾经为汉献帝出谋划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加引起了汉室忠臣的警觉与不满，从而使斗争的程度更加激烈。在斗争中曹操采取了三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表面顺从，不威胁帝位。汉献帝被迎到许昌后，对自己所处境遇十分不满。就在曹操入朝奏事时，献帝对他说：“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对献帝的指斥，曹操可能因感到意外而脸色大变，但他没有做出激烈的回应，只是“俛仰求出”^{[5]453}。《世语》记载：“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6]15}曹操虽然厌恶这个礼仪制度，但还是把它沿袭下来了，只不过自己很少朝见。在曹操挟天子二十四年里，始终没有称帝。建安后期，曹操的权力大至登峰造极，十八年被册封为公，十九年正月，开始“亲耕籍田”，这是天子才可有的行为。十二月，被特许比照天子的规格在仪仗队伍中设置旄头，在宫殿内摆放钟虡。二十年九月，被特许可以秉承皇帝旨意封立诸侯，任命郡太守和国相。二十一年五月，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夏四月，被特许设置天子的旌旗，出入也像天子一样专称“警蹕”。十月，又特许可以像天子那样冠帽上悬挂十二条玉珠串，乘坐金根车，并配置五时副车。所谓汉朝“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6]53}。此时曹操离皇帝宝座仅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曹操始终也没有迈出去，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他甚至认为孙权劝他称帝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献帝曾发除掉曹操的密诏，让董承把密诏藏在衣带中带出皇宫，组织人加以实施。献帝的伏皇后也写过类似的密信。即使如此，曹操也只是处死了董承和他的女儿董贵妃以及伏皇后，并没有触动献帝。

第二种策略，隐忍汉室遗臣的言行。所谓汉室遗臣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随献帝进入许昌汉廷，对以献帝为象征的朝廷仍怀忠诚之心。他们自己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却想借助曹操的力量使汉朝起死回生。他们拥护曹操维护皇帝位置，又对他可能篡位持警惕态度。因此，他们也常常有一些与曹操离心离德的行为。杨彪、孔融、荀彧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荀彧与曹操的关系因内容较多，当另文论述，此仅以杨彪和孔融为例。

东汉太尉杨彪，董卓之乱后从洛阳到长安再

到许昌一直追随献帝。献帝迁到许昌后，大会公卿，曹操上殿，看见杨彪脸色不悦，恐怕他图谋对自己加害，托疾如厕，离开宴会，回到营中。可见杨彪和曹操互为警惕防范的关系。史载：“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5]1789}这种态度显然对曹操“挟天子”不利。袁术僭越称帝后，曹操曾打算借杨彪与袁术有姻亲关系治杨彪的罪。孔融听说后，朝服都顾不得穿就见曹操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说：“此国家之意。”孔融说：“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纓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5]1788}曹操不得已，便把杨彪放出来。

孔融也是汉室遗臣，献帝迁都许昌后，先任将作大匠，后迁少府。史载，“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在朝中颇具有影响力。当他感到曹操“雄诈渐著”后，不堪忍受，“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孔融的偏宕乖忤之词从反对曹操禁酒的书信中可见一斑。曹操上表主张禁酒，孔融大唱反调。曹操给他写信讲古代因酒致亡的教训，孔融回信说：

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悔。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唵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5]2273}

更使曹操不快的是，孔融上奏朝廷“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为什么曹操对此感到不快？张璠《汉纪》说出了问题的本质：“帝初都许，融以为宜略依旧制，定王畿，正司隶所部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6]53}时曹操任征东将军、司隶校尉，其主要根据地是兖州及周边的徐州、豫州部分地区，孔融建议定王畿，把司隶校尉的权力限于千里王畿之内，实际上是主张对曹操的权力加以限制。曹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5]2272}。曹操对孔融的隐忍一直到建安十三年。

第三种策略，迫敌出手，后发制人。此处之

“敌”，是指反对曹操挟天子的政敌，他们与汉室遗臣的不同之处，是对曹操必欲诛之而后安。董承即是一个。建安元年正月，曹操便派曹洪到关中迎接献帝，由于董承与袁术将袁奴拒险，曹洪不得进。是年七月，董承、韩暹、杨奉、张杨等人护送献帝到洛阳。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暹与董承并留宿卫。韩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这点让董承非常不满，他又暗自招曹操进京。曹操不负董承期望，轻易就把韩暹逐出京城，又乘势把献帝迁到许昌，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史载：“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5]2342}董承本来想借曹操的力量除掉干乱政事的韩暹，不料曹操比韩暹更甚。于是董承便与献帝合谋，把诛除曹操的密诏藏在衣带里带出皇宫，欲结交天下义士共诛之。董承出宫后，首先找到刘备，又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曹操对此当有所察觉，据《三国志》载：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6]875}

当时曹操于外正面临袁绍这个强大对手，但曹操却说天下英雄唯有刘备与自己相匹，显然曹操是在表示，真正的对手是刘备而非袁绍。曹操这样说，无非是刺激一下刘备，说明他对董承之谋有所察觉，而刘备的反应则说明他确实参与了董承之谋。仅仅有所察觉，曹操认为还不足以采取行动，他要逼对手先出手，然后后发制人。曹操是这样逼迫对手的：

袁术自败于陈，稍困，袁谭自青州遣迎之。术欲从下邳北过，公遣刘备、朱灵要之。会术病死。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公悔，追之不及。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6]18}

曹操派刘备到下邳截击袁术，程昱、郭嘉显然没有看透曹操的用意，他们力主刘备不可纵，曹操便借势又故意追而不得，这一纵一追可谓一招高棋。以刘备的胆量和气魄，曹操断定他必是董承之谋中的主心骨，把他派出去要击袁术，就使董承的谋划少了有力的骨干。又派人去追，让董承误以为曹操掌握了刘备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使得

董承等人再也坐不住，就急不可耐地要先下手为强。史载：

承等与备谋未发，而备出。承谓服曰：“郭多有数百兵，坏李催数万人，但足下与我同不耳！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服曰：“惶惧不敢当，且兵又少。”承曰：“举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服曰：“今京师岂有所任乎？”承曰：“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是我腹心办事者。”遂定计。^{[6]875}

刘备率军出京，董承借以发动政变的有生力量被釜底抽薪，面对曹操的步步紧逼，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除掉曹操后掌握他的军队。董承没有足以完成大事的力量，被曹操剿灭是必然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做到了知行合一。曹操的“知”即对“挟天子”的意义有深刻认识，“行”即把“挟天子”付诸实施。在付诸实施中，需要有应对各种不利自己势力的勇气，也需要应对不同反对力量的策略。

从政治史角度看，“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特征的策略。在天下分崩离析朝廷躯壳尚存之际，时人既能够认识到“汉德虽衰，天命未改”，又认识到在这个躯壳下逐渐整合分崩的碎片，达到局部统一，进而恢复传统的大一统，“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必需的选择，这体现了时人对社会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是认知层面的智慧。这种认知智慧并非曹操一人所有，而是一些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士的共识，是集体的智慧。曹操既是这个智慧的实践者，又在实践过程中同样表现出政治家的智慧。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多层智慧的整合。

参考文献：

- [1]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2] 赵蕤. 长短经·卷7·时宜[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第849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3] 李昉, 等. 太平御览·卷92·皇王部·孝灵皇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4] 顾炎武. 日知录·卷13·两汉风俗[M]. 黄汝城, 集释. 栾保群, 吕宗力, 校点.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0.
- [5]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6]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9·献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责任编辑: 罗 操